

衡东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衡东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6

衡东文史

第六輯

97121/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衡东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目 录

革 命 史 话

- 罗荣桓稳定苏鲁豫边区局势……………谭长春 (1)
罗元帅的黄河行……………刘燕南 (6)
解放初期石湾区的农村公开建党……………曹 俊 (12)
土改前后的衡东民兵……………龙合赤 (17)

革 命 烈 士

- 生在江南，死在塞北
——革命烈士周月南传略……………刘燕南 (22)
烈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忆周月南烈士……………刘国安 (29)
献给牛山同志……………杨文震 (33)
向彦臣传略……………谭庆麟 陈昌年 (36)

近 代 人 物

- 彭一湖与衡山实验县……………向中柱 陈昌年 (38)
先父彭一湖传略……………彭廉仲 (42)

著名数学教师文亚文·····	谭庆麟、李秋黄 (44)
刘岳峙其人其事·····	周先谅 (46)

回 忆 录

我任抗日青工队长前后·····	谭 璜 (52)
黎明到来之前 ——忆解放前夕的“平民社”·····	赵 恒 (72)
我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胡 焜 (78)
我的片段回忆·····	丁余龙 (84)

创 业 史

衡东水电建设高潮的形成·····	赵润芝 (88)
梯级开发洙水的第一步·····	赵润芝 (96)

地 方 史 话

昔日的拜朝岭·····	李楚元 (99)
漫话吴集·····	李楚元 (103)
衡东县集镇小史·····	陈昌年 (108)
文征明的先世是衡东人·····	肖 汉 (113)
衡东历史上之最(二)·····	刘植槐 赵润芝 (119)
衡东诗歌、对联拾存(二)·····	李楚元 罗立德 (124)
石湾的麻糖和烧饼·····	文金友 (131)
后记·····	编 者 (134)

罗荣桓稳定苏鲁豫边区局势

谭长春

在罗荣桓元帅生平活动的年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39年11月，星夜赶赴湖西地区，及时处理‘肃托’错误事件，保护了大批干部，稳定了该区局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从1939年8月开始，处于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湖西地区（微山湖西面地区，当时称苏鲁豫边区，辖20余县）出现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当时，这个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异常复杂，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错：一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群众抗日团体迅速发展；二是日本侵略者不断调兵遣将，抢占交通要地，企图摧毁我苏鲁豫边区的抗日力量；三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苏北国民党专员阴谋策划反共，妄图把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挤出苏鲁豫边区。此外，还有康生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也在该地区的中共党内广为流传，报纸上报导的关于国内外反托斗争的消息也不断出现，许多人对托派产生了异样的恐惧心理。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苏鲁豫边区

本文是中共衡山县委党史办副主任谭长春同志收集资料进行整理的。

的主要负责人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对形势中的重大问题无法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因而导致了“肃托”事件的发生。

这次“肃托”事件的制造者乃当时边区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王宏鸣。两王利用种种手段，蒙蔽苏鲁豫边区党委一班人，要挟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无中生有地制造一起又一起的骇目惊心的屠杀案件。

“肃托”开始后，王须仁、王宏鸣等人使用各种刑具，大搞逼供讯，以托派罪名残杀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干部。这些被害的同志中，上至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军事部长，下至县区的党委委员、军队的连排干部。两王究竟残害了多少人，当时无法统计，仅谷亭镇一次大残杀，被害者就有47位。

正当两王杀红了眼的时候，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接到情报，急电苏鲁豫边区党委（时边区党委成员已被杀得没剩几个），严令王须仁、王宏鸣等人立即停止捕杀。与此同时，山东分局党委也以同样的内容，数次发出急电严禁捕杀。但两王违抗命令，我行我素，继续“肃托”。这样，又一批县、区级干部倒在“肃托”的血泊中。两王进而挟持白子明，以办训练班为名，将县委、区委、部队的领导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捕杀，把“肃托”的矛头指向了主力部队。在训练班里，苏鲁豫边区前任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祚、苏鲁豫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相继被捕监押。三位同志是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边区群众和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逮捕、关押、审讯这些同志，引起了边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剧烈的震惊。

在训练班里，遭到关押尚未被杀害的同志们串联起来，立即将边区“肃托”事件写成报告，托监外的同志想办法急速送往

一一五师政委和山东分局党委，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身上。

罗荣桓得知情况后，担心该地区抗日形势恶化，决定亲自前往湖西处理问题。1939年11月里一天星夜，他不顾白天工作的疲劳，和随行人员赶赴湖西。当来到湖东地区时，正遇上从湖西赶来送报告的同志。罗荣桓阅完报告，更觉得问题严重，于是快马加鞭，疾奔湖西。

白子明、王须仁为了将郭影秋等人打成“托派”，再一次提起审讯。他们将郭影秋和民运干事陈景文等人押进一个院子，王须仁首先审讯陈景文，逼其承认“托派”身份。他见陈景文不屈服于淫威，竟用木榔头将其活活打死，并恶狠狠地威胁郭影秋等人：“你们谁不承认，谁就是陈景文同样的下场！”

这天下午，也就是在陈景文被害的4个小时之后，郭影秋又被提审。他被带到一家四合院的西屋里，屋里的桌子后面坐着几位陌生人，可是周围并无上午审讯时的恐怖气氛。当郭影秋正在疑惑时，一位陌生人首先发话：“你叫什么名字？”

“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肃托是正确的，但我被人冤枉了。”

“谁冤枉了你？”

“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供认我是托匪。可我并不是托匪，难道他不是冤枉了我？”

“郭子化自首，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白子明审问我时，拿出山东分局的电报来，他亲口念给

我听的。”

“岂有此理！”陌生人掌击桌子，“郭影秋同志！分局根本就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什么自首，这完全是捏造！”

说到这里，陌生人作自我介绍：“我是罗荣桓，”接着，又指着旁边的同志说，“这是张经武同志（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这是郭洪涛同志（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马上会见到他。”说着，罗荣桓命令战士给郭影秋松绑。

原来，郭影秋被捕后，王须仁、白子明对他用了多种刑罚，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竟生一计，伪造出一份山东分局的电报，说山东分局的郭子化已经自首，不仅交了自己的托派身份，而且供出郭影秋等人也是托派。

罗荣桓赶到湖西边区出事地点后，拒绝看王须仁等人整理的关于所谓托派的“口供”材料，叫拿原始材料看。然而原始材料全部被王须仁隐藏了。在听白子明等人汇报时，罗荣桓愤怒斥责：“你们抓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事先不向山东分局报告请示？”白子明哑口无言。为了彻底弄清事件真相，于是罗荣桓演出了“提审”郭影秋的一幕。

郭影秋得救了，梁兴祚、李贞乾得救了，一大批被捕的干部、党员得救了。

接着，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采取紧急措施，进行一系列善后处理工作：一是全部释放蒙冤受屈而遭关押的同志，让他们重返自己的工作岗位；二是解散“训练班”，迅速恢复了县委、区委领导班子；三是改组苏鲁豫边区党委；四是将首恶分子王须仁逮捕起来，押送一一五师保卫部，听候处

置，五是將少数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问题尚未弄清的人，送山东分局审查处理。

上述紧急措施和一系列工作，从根本上制止了对广大干部和党员的乱捕乱杀，彻底扭转了湖西地区由于“肃托”事件的发生所造成的险恶局面，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从此，湖西抗日根据地又重新巩固，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在该地区又蓬勃发展起来。

罗元帅的故园行

刘燕南

1956年9月，罗荣桓同志因病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职务后，日常工作负担本来可望减轻，但不久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感到需要用较多的时间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作些调查研究，以便及时向党中央反映。于是，他在11月，偕同夫人林月琴，带了女儿巧巧，以及秘书、医生、副官等几个随行人员，从北京乘火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湖南视察。在长沙只住了一晚，便在四十七军政委张天云的陪同下，乘军用吉普车南下，途经大托铺、易家湾和湘潭等地，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衡山县（包括今衡山县、衡东县、南岳区）。

那时，我在衡山县委办公室任综合干事，记得早前一个深夜，衡阳地委用电话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县委。但当罗荣桓同志到达县城的那一天，县委书记和县长均下乡去了，只好由在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胡心平和县兵役局长郭耀武两人负责接待。

本文作者当时任中共衡山县委办公室综合干事。

上午11点，胡、郭二人估计罗荣桓同志一行快要到达衡山城了，便守在县委机关门口等候。可等了半天，只见门前广场上开来两辆空着座位的吉普车。一打听，才知道罗帅一行在后面步行。因为那天正是衡山县城的墟期，赶墟的人特别多，我们生怕罗帅一行有什么意外，正准备派人分头上街去找，只见罗帅身着褪了色的黑呢中山装，头戴呢解放帽，脚穿布鞋，手策拐杖，安详地和随行人员一道从县人委会后门穿过广场走了过来。

原来罗帅一行乘坐的吉普车驶进县城北门时，他们便下车步行。罗帅边走边看，操着一口地道的衡山方言，在北街这家摊贩、那家店铺面前问这问那，并在四牌楼（十字街口）一家小百货店门前停了下来，向一位年岁很大的售货员问好之后，便打听一位姓赵的钟表匠和一位姓邓的补鞋匠的下落。当他听说这两人均已去世时，他的眼睛湿润了，长叹了一口气，说：“多好啊！”因为在大革命时期，姓赵的钟表匠所开的店子就是当时县委的联络点，罗荣桓同志在这里与县委负责人接过头，所以认识了这位钟表匠。那姓邓的补鞋匠是罗荣桓同志在1927年夏离家赴武汉路过衡山县城时，发现有人盯梢，他急中生智，装做补鞋，在姓邓的掩护下，才摆脱了敌人。虽然事隔多年了，罗荣桓同志却还牢记在心，怀念着这两位为革命作过贡献的普通群众。

当罗荣桓同志一行穿过广场时，郭耀武急忙跑步向前致敬，行了军礼。罗帅热情地与老郭握手，连说：“同志，你好！”郭耀武紧握着罗帅的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罗帅回来了！”这一喜讯不胫而走，传遍了县委机关大院，人们纷纷鼓掌，争着和罗帅握手。胡心平、郭耀武将罗帅一行

迎到了县委会楼上一间陈设简朴的小房子休息。老胡抱歉地说：“我们县委没有添置一点家具，连张沙发也没有。”罗荣桓同志坐在一张竹做的围椅上笑眯眯地回答：“很好嘛，这竹椅子准是我们草市、南湾一带的特产呀！”老胡请示罗帅是否要县委书记和县长回来一下，罗帅说：“县委书记和县长带头下乡，这是种好风气，不要喊他们回来了！这次，我不过是路过这里，顺便看望家乡人民。”老胡又问他是否打算回南湾老家，罗荣桓同志说：“到了县委会，就是到了家里一样嘛！”他的这些话，包含着多少深情厚谊啊！

罗荣桓同志在县委会没有要老胡、老郭等作工作汇报，而是从谈家常入手，涉及到多方面。他老人家问了县委机关的房子够不够，食堂生活需要多少钱一月，干部下乡怎么坚持学习等问题，也问了白莲寺的向家、富塘的罗家、石湾的刘家、后山的赵家这些在解放前是全县著名的望族近几年有什么变化，现在还有没有人在外面读书、做事……他一边听取接待人员的回答，一边感慨地说：“过去这么大一个县，就被这几家望族把持了，若不经一番暴风骤雨，这些地主庄园是冲不垮的。”他老人家接着又说：“这几个家族过去读书的人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和研究社会科学的都有，这些读书人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有用处呀！”罗荣桓同志用一分为二的观点，阐明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罗荣桓同志在谈家常中，还从坐着的竹围椅，把话题引向他的青少年时代一系列的美好回忆。他说：“我小时候曾去过杨林四峰山十八湾岭上，看到那里大的楠竹可以做饭甑，粗杉树可以凿棺材，不知现在怎么样？要是全县的山山岭岭都和四峰山一样，我们的用材就不成问题了。”他勉励家乡人民进一步

搞好绿化。又从涿河的自然风光问到治水问题，他说：“白茅洲、芒洲、小岳洲这些洲上，一到秋天，白芦红桔，碧水蓝天，交相辉映，至好看哩！只可惜涿河水浅、滩多，不利于舟楫航行。特别是大岳滩、三体花这几处地方，礁石多，水流急，船工见了就害怕，不知现在怎样？”当接待的同志告诉他，县委即将拟订一个全面的治水规划时，他频频点头说：“好！”并一再叮嘱县委要切实抓好治山、治水，把家乡建设好。

罗荣桓同志一行在县委会只停了两、三个小时，随即驱车直奔南岳，视察了祝融峰农业社，会见了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康菊英，在店门前公路旁的一户社员家听取了康菊英汇报农业社的情况。康菊英用南岳山下的清泉泡了一壶云雾茶给罗荣桓同志一行解渴，罗帅接过一杯茶，风趣地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杯茶，我一定把它喝完。”他老人家问康菊英：

“社员有钱用吗？”

“有是有一点，但还不够。”

“这是句老实话，没有吹牛皮。我看这户社员家里，虽是栋茅屋，但还整洁，有点兴旺气象，房里也有点新用具。不过衣食住行要统统改善，还不容易，要努一把力啊！你们除种好田外，还要寻个门路抓些现金。”

康菊英向罗帅汇报了农业社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的情况，诸如搞了纸槽造纸，板车运货，水库、山塘养鱼，还组织了社员上山采药，打猎，或在家织草席……罗帅听了很高兴地说：“就是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衡山人有句俗话，不要织了箍去买鸡蛋——大的也不要，小的也不要。农业

社光是抓几粒死谷子怎么行呀！”

康菊英还请求罗帅对农业社的工作多作些指示，罗帅谦逊地说：“我是个带兵打仗的，没有直接抓过农业生产，今天是特地向你们内行来请教的。”他笑了笑又说：“你是劳动模范，又是人民代表，今后你要多把一些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反映。”在南岳，罗荣桓同志一行还游览了大庙，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他一再指示陪同他的地方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在半山亭的玄都观前，他看到一个石狮摆歪了，立即动手把它扶正。在福严寺看到一块木刻浮雕被损，他当即指出：“这是一件多么精致的艺术雕刻啊！任意破坏，岂不是败家子？”

罗帅有非常丰富的文史知识，在磨镜台，他给陪同人员讲述了磨镜台的来历；在邨侯书院，他谈了这位唐代历仕三朝的中兴名臣李泌的故事。

罗帅教育地方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宗教政策。半山亭派出所一位同志向他汇报：“有个尼姑想还俗结婚，但当地佛教协会的负责人不同意，应该怎么办？”罗帅笑着说“世间的事是复杂的，有的人看破红尘，有的人迷恋红尘，但谁也超脱不出红尘，这是个严峻的现实。我们不要禁止他（她）们还俗，也不要去强令他（她）们还俗。要对这些人多做工作，使他（她）们既懂得科学，也懂得民主。”

在祝融峰的望日岩侧，罗帅视察了高山气象站。这个站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些从部队转业来的年轻小伙子，他们常年坚持在这云雾山中与雷电风云打交道，为祖国猎取气象情报与资料，不但工作辛苦，而且生活也较清苦。特别是一到秋冬，他们的生活物资均是靠肩挑背负从山下运上山来，好不容易！但

这些年轻人以苦为乐，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种了蔬菜，还新开了球场，营建了文娱室，工作之余，打球的打球，吹笛的吹笛，弦歌之声不绝于耳。罗帅详细地问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盛赞这批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勉励他们扎根高山，进一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罗帅了解到这批年轻人大部分尚未结婚时，就向站长老韩建议：“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帮助解决，不要把气象站变成了和尚庙。”

罗荣桓同志一行当晚宿于磨镜台，招待所的人要为他们设宴洗尘，元帅坚决劝止了，只叫厨房炒了几样简单的菜，还请人弄了些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吃得津津有味。他边吃边说：“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说粗一点，但营养价值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

罗荣桓同志于1956年冬初回衡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给家乡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解放初期石湾区的农村公开建党

曹 俊

1949年10月6日，衡山县（包括今衡东、衡山、南岳两县一区）全境解放。1950年冬开始进行土地改革，1951年冬土改结束。县委根据省、地委指示精神，于1952年元月，集中各区干部的大多数到第一区（今衡东石湾镇、大桥乡、三樟乡）、第三区（今衡东白莲乡）进行土改复查试点，并在土改复查过程中，遵照省、地委的布置，在农村公开建党，将在土地改革、土改复查等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积极分子，于1952年4月复查结束时发展入党。我是1952年5月调到第一区担任副区长、区委书记的，对该区公开建党情况颇为了解，现在根据留存资料和自己的回忆简述于下：

第一区辖茶石、甲枣、坪源、清水、鳌石、三樟、皇嘉里、油麻、柴山、岭林、义门、大桥、黄桑、茶花（今属湘潭县）、高桥、石桥（此二乡属今衡山县）等16个乡（村）。当时只在茶石、甲枣、坪源、清水、鳌石、三樟、皇嘉里、油麻、柴山、岭林、义门、大桥、黄桑等13个乡（村），进行

作者当时任石湾区副区长、区党委书记。

土改复查，发展党员，公开建党。省委的指示精神是：培养积极分子的工作应作为考察土改复查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工作开始到结束，都要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因此，土改复查工作队进入乡（村）以后，即注意物色培养对象，给对象分配任务，把他们放到工作中去考验，通过每段工作的检查总结，考察其立场、观点、作风等方面的表现。过了一段时间，干部汇报情况，初步确定积极分子名单。于是，工作队中的党员干部分工负责或指定专人和积极分子进行个别谈话，并向群众了解，然后根据各方面材料，进行对照，将其出身、成份、简历以及各方面的表现，扼要写成材料，经工作队队长签名盖章，区委会研究，符合五大条件的积极分子就被确定为建党对象。这些对象经过接受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符合党员八项条件的，就可以办理入党手续了。

积极分子需要具备的五大条件是：

第一条，成份好，历史清楚。即本人成份（社会地位）应该是工人、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至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则必须是抛弃了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并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历史清楚，即能将自己的历史、政治经历和社会关系，老老实实地忠诚坦白地向党交代清楚。亦即把自己参加过什么，是怎样进去的，进去后担任过什么，活动情况，怎样出来的，现在的认识怎样，一一作出交代。同时，在每个阶段中参加的组织与活动需要适当的证明人，并从思想上划清界线，深刻的认识它，仇视它和批判它。特别要注意的是搞清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组织，过去它的政治地位、经济背景；分清是欺骗、威胁进去的，还是自愿进去的。